

# 湖北武当山五龙宫遗址出土明代投龙筒研究

康予虎<sup>1</sup> 李嘉鑫<sup>2</sup> 李刚<sup>3</sup> 何龙翔<sup>4</sup>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4.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 武当山五龙宫, 石筒, 金篆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 投龙仪式

**摘要:** 2020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武当山五龙宫遗址发掘过程中, 在五龙井内发现一块由青砂岩制作的石筒。该石筒制作于明永乐二十二年, 其上刻文记载了永乐皇帝敕命道教天师张宇清在武当山举行金篆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 后于五龙宫内开展投龙仪式的历史事件。本文通过比照石筒刻文和文献史料, 诠释此次金篆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的祈福目的和背景, 并对投龙仪式进行解析。

**KEYWORDS:** Five-Dragon Temple of the Wudang Mountain, Stone tablets, Great Offering to the Veil Heavens, Rite of casting-dragons

**ABSTRACT:** In 2020, excavation at the Five-Dragon Temple in the Wudang Mountain, Hubei Province, has recently unearthed a stone tablet dating to the Yongle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tone inscription records a historical event in which the Emperor Yongle instructed Taoist master Zhang Yuqing to perform a rite known as the 'Great Offering to the Veil Heavens' at the Wudang Mountain, followed by the rite of casting-dragons at the Five-Dragon Temp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im and context of the sacrificial prayer festival by analyzing the stone inscriptions and historical text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the casting-dragons ritual.

武当山, 又名太和山, 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是道教四大名山之一。早在三国时期, 武当山就已开始有道教活动, 历经六朝及隋唐时期的发展, 至唐末五代时, 被道教著名学者杜光庭所编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入七十二洞天之内。宋元时期, 真武信仰在武当山兴起, 并被宋、元两朝皇帝所推崇, 他们在武当山上敕建了大量与祭拜真武有关的道教宫观。后宋元交兵及元末战乱, 武当山上包括五龙宫在内的道教宫观大部分毁于兵乱。明初, 出于对真武的尊崇, 明成祖朱棣在武当山敕建含五龙宫在内的以“九宫八观”为代表的道教宫观建筑群, 并将其打造成为明朝皇室家庙。明末以后, 随着武当道教的衰落, 武当山的道教宫观建筑也逐渐衰败。1994年, 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 五龙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存世文献及碑刻文献记载, 五龙宫始建于唐贞观年间, 历经宋元时期的数次营建与毁弃。五龙宫现有的整体建筑布局始建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年(1412年),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世宗朱厚熹又开展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后, 五龙宫达到鼎盛时期。明末, 五龙宫开始衰败, 逐渐废弃成为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0年开始对五龙宫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在清理五龙宫五龙井时发现一块由青砂岩制作的石筒。该石筒为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制作, 保存较好。石筒整体呈长方形, 左右顶角处斜切。长50.5、宽19.5、厚4.5厘米。石筒正面楷书阴刻, 背面篆书阴刻。刻文内涂抹朱砂, 多数脱落, 仅局

部现存(图一)。

### 一、简文识读与文献比照

石简正面有9行楷书,每行12~42字,满行42字。部分文字剥蚀,现可辨认244字。刻文识读如下:

上清三洞宝箓灵宝领教玄化真人、南曹执法仙宰、行诸司院府便宜事,嗣教四十四代天师臣张宇清,欽奉/……遣代礼内臣尚辽等,谨取七月十九日为始,特命正一副教真人率领道众,虔就/大岳太和山玄天玉虚宫,修建/金箓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七昼夜,至二十五日满,散修



图一 投龙简正、背面拓片(比例约为1/3)

设/醮，礼三千六百分位，少伸诚恳，以答/天心，以令行道。事毕，投筒圣井，愿神愿仙，九府水帝，十二河源，江河淮济，溟泠大神，冀录善功，上名/九天，请诣水府，金龙驿传，一如告命。/

永乐二十二年，岁在甲辰，七月甲戌朔，二十五日戊戌。于兴圣五龙宫圣井告下。/上清三洞宝箓灵宝领教玄化真人、南曹执法仙宰、行诸司院府便宜事，嗣教四十四代天师臣张宇清，承诰奉行。/

石筒背面有3行云篆，每行8字，共24字。该云篆在《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sup>[1]</sup>《太上黄箓斋仪》<sup>[2]</sup>《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sup>[3]</sup>等道经中均有收录，参考以上道经后释读如下：

九河倾訖，鸟母群飞，/蛟龙通道，水陌洞开，/赤文玉书，驿龙风驰。/

据石筒刻文内容可知，该筒主要记录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明成祖朱棣派遣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在武当山举行金箓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后将书写诰文的石筒投至五龙宫五龙井内，以向上天祈福的历史事件。

同时，在明代任自垣编纂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大明诏诰》内，有明成祖敕命张宇清进行斋醮仪式的记载，可与此次考古发现的石筒文字互证：

上清三洞宝箓灵宝领教玄化真人、南曹执法仙宰、都天大法主、行诸司院府便宜事，嗣教四十四代天师臣张宇清，钦奉圣旨：“朕祇承天眷，统绍鸿图。深惟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妣孝慈高皇后，一德一心，同勤开创，建太平之盛业，启万世之弘规，敷佑朕躬，嘉惠万姓，恩深德厚，欲报无由。仰惟大岳太和山，实北极玄天上帝修真显化之所，肃命臣工创建宫观，及于峰顶冶铜为殿，范神之像，以虔祀事。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四海苍生祈福，俾雨暘时顺，百谷丰登，家给人足，灾沴不生。爰自经始以

来，神贶昭彰，瑞应骈集，祥光圆朗，炳烛于太虚，圣像驻临，隐现于霄汉。山川增色，草木腾辉，灵异缤纷，莫能殚纪。今宫观告成，及以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为始，至二十五日圆满。特命正一副教真人张宇清，率领道众，于玄天玉虚宫，修建金箓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七昼夜，计三千六百分位，分就静乐宫、兴圣五龙宫、太玄紫霄宫、大圣南岩宫、大岳太和宫、遇真宫，讽诵经诰，积崇善果，少伸诚恳，以答天心。尚冀皇灵陟降，馭光景以长存；宝祚安隆，协雍熙而永治，锡眇躬之清泰，保命运之光亨，济及幽明，恩霑遐迹。伏愿天心洞鉴，帝德弘敷，神道丕扬，式共乾坤之久远，威灵赫奕，永符海宇之瞻崇。雨顺风调，民安物阜，皇图巩固，宗社均安。钦此。”<sup>[4]</sup>

同书中，张宇清向神灵告知的《延禧表式》，以及用青藤纸、朱砂书写向神灵祈祷的《青词式》中，亦有关于此次金箓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的记载：

上清三洞宝箓灵宝领教玄化真人、南曹执法仙宰、都天大法主、行诸司院府便宜事，嗣教四十四代天师臣张宇清，诚惶诚恐，稽首顿首，百拜上言，臣钦奉圣旨：“以今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特命率领道众，于大岳太和山玄天玉虚宫，修建金箓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七昼夜，计三千六百分位。式赖憇懔之赐，允祈保庇之仁。钦此。”臣钦承惟谨，依教奉行，谨具表奏闻者。伏以肇启神宫，庸展尊崇之志；敷扬金箓，特伸报谢之诚。庆协天人，光昭宇宙。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恭惟金阙至尊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维持造化，主宰乾坤，阖辟阴阳，措八弦于熙睟，敷施雨露，纳四海于亨嘉。惟兹道德之难名，深愧涓埃之莫报。皇灵昭格，仰祈化度之机；品汇熙雍，均赖生成之锡。敷佑眇躬之清泰，永绥基祚

之康隆，济及幽明，恩霑遐迩，伏愿上玄洞鉴。大造垂慈，广运化机，茂锡骈蕃之福；覃敷景贶，尚资保庇之仁。干冒天威，臣下情无任不胜激切之至。谨奉表上奏以闻。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再拜谨言。永乐二十二年岁次甲辰七月廿日，具位臣张宇清表奏。（《延禧表式》）<sup>[5]</sup>

维永乐二十二年岁次甲辰七月甲戌朔二十五日戊戌，嗣天子臣，即日冒干天听，以今月十九日为始，命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率领道众，于玄天玉虚宫修建金篆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七昼夜，祇答上玄，少伸诚悃。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四海苍生祈迓福祉，锡佑眇躬之清泰，永绥基祚之康隆。济及幽明，恩霑遐迩。以今斋事圆满，祇设三界列真清醮三千六百分。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斋沐裁词，上奏玉清、上清、太清、金阙、勾陈、紫微、后土玉陛下。伏以肇启神宫，式钦崇于妙道，祇宣玄教，庸致禱于高穹，敬展报谢之诚，仰答甄陶之锡。伏愿天心洞鉴，帝德弘敷，神道丕扬，式共乾坤之久远，威灵赫奕，永符海宇之瞻崇，雨顺风调，民安物阜，皇图巩固，宗社均安。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词。（《青词式》）<sup>[6]</sup>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可知，此次斋醮活动的背景是在武当山主要宫观建成后，明成祖朱棣下旨，在武当山玉虚宫、五龙宫等宫内举行一场金篆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祭献明太祖朱元璋及马皇后的在天之灵，感恩真武大帝庇佑，祈福普度天下苍生，达到保佑大明王朝长治久安、皇朝永固的目的。

## 二、石简术语考释

为深入分析和理解石简的刻文内容及功能，特选择部分关键词和术语进行考释：

### 1. 金篆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

金篆报恩延禧斋是金篆斋法的一种，属道教诸斋法之一，主要用于皇家祈禳。《唐六典》规定：“……斋有七名：其一曰金篆大斋，调和阴阳，消灾伏害，为帝王国土延祚降福。”<sup>[7]</sup>杜光庭在《金篆斋启坛仪》记载，金篆的作用为“国主帝王镇安社稷，保佑生灵，上消天灾，下禳地祸，制御劫运，宁肃山川，摧伏妖魔，荡除凶秽”<sup>[8]</sup>；罗天大醮则是道教最为隆重的斋醮科仪之一，所谓“罗天”，即天之三界之上的大罗天。以“罗天”为醮名，有网罗诸天诸地之意。

### 2. 金龙驿传

道教视金龙为帮助传递章表文书的灵兽，《太上黄篆斋仪·投龙璧仪》中记载：“龙者，乘云气，御阴阳，合则成体，散则成章，变化不测，入地升天，故三十六天极阳之境，可以驿传信命，通达玄灵者，其惟龙乎？是以上天以龙为驿骑，往来人间矣。”<sup>[9]</sup>

### 3. 九府水帝，十二河源，江河淮济，溟冷大神

该句是投龙简中特定的标准格式，最早出自《太上黄篆斋仪·投龙璧仪》，原文记载：“臣等至心皈命扶桑大帝，暘谷神王，三河四海、九江水帝，十二河源水府神仙诸灵官。三礼，各虔诚忏悔。”<sup>[10]</sup>九府（江）水帝，是指统摄三河四海水中神灵的水官大帝所设的暘谷洞源中宫、清冷左宫、北酆右宫，每宫又设三府，共计九府的神灵；十二河源，是指在天河中炼度死魂的神灵；江河淮济，分指长江、黄河、淮水、济水四水主管神灵；溟冷大神，是指为地府地狱中主管除罪、拔度亡魂的神灵。

### 4. 九河倾訖，鸟母群飞，蛟龙通道，水陌洞开，赤文玉书，驿龙凤驰

本段文字为云篆书写，云篆是指道教在科仪法会所书写的经文，字体似篆，但笔画多曲叠，据传是由天降云气而自然凝结成的文字。全文出自古灵宝经《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北方黑帝灵宝赤书玉篇》<sup>[11]</sup>右二十四字制水秘文，书于洞阴朔单郁绝元台。其含义为

威慑北海的水帝（龙王）管制水中精物。招蛟龙兴云致雨。

通过对石筒文字的考释，可知本次五龙宫内考古发现的石筒为一块投龙水筒，是道教斋醮科仪中投龙仪式的重要实物。

### 三、投龙仪式的源流

投龙仪式是道教斋醮科仪中的重要一环，“国家保安宗社，金篆籍文，设罗天之醮，投金龙玉简于天下名山洞府”<sup>[12]</sup>。投龙仪式脱胎于东汉时期三官手书。所谓三官手书，见于《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引注《典略》：“……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sup>[13]</sup>即将道民的忏悔文书分为三份，分别埋于山上、地下和水中三处，以谢天、地、水三位神灵。东晋末刘宋初古灵宝经《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等书从五篇天书真文中引申出若干仪式，将“元始灵宝告水帝削除罪简上法”“元始灵宝告五岳灵山除罪求仙上法”“元始灵宝告九地土皇减罪言名求仙上法”三篇并称为“投三元玉简”，这就是融摄天师道和方士传统的投龙筒仪雏形，常在灵宝传授仪或斋仪结束时举行<sup>[14]</sup>。

唐末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投龙璧仪》记载：“大道以一炁生化三才，陶钧万有，故分三元之曹，以主张罪福，即天地水三官，实司于三元也。人之生死寿夭，罪善吉凶，莫不系焉。三篆简文，亦三元之典格也。”<sup>[15]</sup>并对三种投龙筒的科仪、法式和步骤进行介绍。

北宋张商英奉圣旨对投龙筒的仪式进行删改，并做《金篆斋投简仪》对筒文的格式和制度进行统一化<sup>[16]</sup>。对皇帝、官员、道士等建醮仪轨、祈神上奏作出详细规定，首列投简仪节次及祝词咒交等。元代林灵真编撰的《灵宝领

教济度金书》，对投龙仪式的斋醮仪式进一步细化，其词章格式与《金篆斋投简仪》近似，仅在投简仪式规模和级别上略低<sup>[17]</sup>，多被后世民间所遵循。

在道教体系中，投龙仪式的理论在汉代开始出现，东晋末年逐步成形。唐代进一步得到发展，至宋代投龙仪式开始规范化。元代臻于完善，并逐渐固定程式，并为后世所遵循。

### 四、投龙仪式的科仪

投龙仪式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神沟通的认识以及仙界观的架构，更是上升到国家祭祀层面的重要活动。它对投放地点、投放仪式、投放礼器形制以及简书体例内容都有一定的要求，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理论体系。投龙仪式具体的科仪目前仅能通过相关文献记载和发现的投龙简书内容进行探析。

#### 1. 投龙筒的投放地点

据唐代敦煌文书P.2354写本记载，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中均要建立起举行投龙仪式的祭祀场所，即“比投龙使不索龙壁，举亦不造坛。奉敕投告，若省定州名山水府，自然依准。若定州未定名山水府，事须择图经、检古迹，论定堪投处所，令遣造坛”<sup>[18]</sup>。到了宋代，仁宗对投龙筒投放的地点亦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天圣三年九月）乙酉，上谕辅臣曰：每遣中使往名山洞府投龙筒，如闻多在僻远，其赍送祭醮之具颇以扰民，自今其罢之。”<sup>[19]</sup>“（天圣四年十二月）辛巳，道录院所定名山洞府岁投龙筒者二十处，余悉罢之。”<sup>[20]</sup>按投放地的不同，将投龙筒分为投山筒、投土筒、投水筒三种，用以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告知天官上元、地官中元、水官下元三官神灵，求得社稷平安、国祚绵长。本次发现投掷在五龙井内的投龙筒即为告知水官下元的投水筒。

#### 2. 投龙筒的投放仪式

据唐代《太上黄箓斋仪》记载，三种投龙

筒投放仪式大体相同，但是关告的神灵有部分不同，念诵的咒语不同<sup>[21]</sup>。经北宋和元代细化、调整后，原有的投放仪式已不适合本次皇家敕命的投龙仪式。因此本次投放仪式以北宋张商英《金篆斋投简仪》的记录为主，部分参考元代林灵真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记录，再结合张泽洪的《道教斋醮符咒科仪》中投水筒仪的程式，具体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选取高功法师建法坛开设道场并焚香；第二，静坛、敕水后，法师宣读五方卫灵咒；第三，法师鸣法鼓二十四通，点香炉后，向负责传递的神灵（金龙）读祝文陈述传达的神灵；第四，法师对所祈祷的神灵（真武大帝为首的众神）自报法职法位，读祝文陈述投简祈愿目的，参与者高声赞祝；第五，用青纸封筒，再用青丝缠金龙、金钮、玉璧等投龙礼器，捧投龙筒横于香烟上，将投龙筒投于洞天福地内，念投水筒咒山呼功德后，结束仪式。

本次五龙井内投龙仪式的高功法师为正一派领袖龙虎山张宇清天师，参与者包括隆平侯张信、礼部尚书金纯、工部右侍郎郭璉、礼部左侍郎胡濙等“钦差到山建醮”的中央官员，以及武当山各宫观提点、住持、钦选道士等众。前文所记的《延禧表式》可能为第三步中向金龙诵读传递的诰文，而《青词式》为第四步中陈述投简祈愿目的祝文。

### 3. 投龙筒的礼器形制

在举行道教斋醮科仪后，将祈福禳灾的文字刻在筒上，还需与玉璧、金龙、金钮等礼器用青丝捆束，一起投放到名山大川中。刘宋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记载：“用金龙、金钮各三枚，投山、水、土，为学仙之信。”<sup>[22]</sup>同为明初的武当山明湘王投山筒就发现有伴出的玉璧、金龙等礼器<sup>[23]</sup>。但本次武当山五龙宫遗址田野考古发掘并未发现玉璧、金龙或金钮等礼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投龙仪式的五龙井一直被作为水源使用，历经淘洗清理，体积较小而又引人注目的金玉器可能在早期被人拾取，只有相对笨重的石筒得

以留存。

### 4. 投龙筒的诰文文字体例格式

目前发现的唐代至北宋前期投龙筒在诰文书写格式和内容上并不统一。至北宋张商英奉旨编写出《金篆斋投简仪》后，诰文的内容和书写格式才开始程序化，并为后世所仿效。其中《水筒式》诰文内容如下<sup>[24]</sup>：

嗣天子臣伏为迎祥集福，祇建冲科。谨赍龙璧信币之仪，命道士几人于某宫观某殿，开启金篆道场几昼夜。罢散日，设普天大醮一座，三千六百分位。告盟天地，纪算延厘。斋事周圆，恭陈大醮。谨依旧式，诣水府投送金龙玉简。愿神愿仙，三元同存。九府水帝，十二河源，江河淮济，溟冷大神，至圣至真。鉴此丹恳，乞为眷奏。上闻九天，谨诣水府，金龙驿传。

某年太岁某甲子几月某朔几日某甲子于道场内吉时告闻。

对比可知《金篆斋投简仪》中规定的文本与本次出土投龙水筒的整体内容相近，仅在开头部分对建醮仪式的描述有所不同，可能为建醮的等级与建醮法师级别称谓不同所致。

## 五、五龙宫投龙水筒的背景和意义

宋代《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将武当山认定为真武大帝的修道和飞升之地，武当山逐渐成为真武的道场。元代，因真武大帝与仁宗生日相同，为笼络信众，祝釐天下，元仁宗在武当山五龙宫遣使举办金篆斋以庆祝皇帝生日的天寿节<sup>[25]</sup>，进而推动武当山成为天下名山。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成功后，认为自己多次被真武大帝“庇佑”，在其敕书当中多有“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sup>[26]</sup>等语，又兴于北方而继承大统。因此他格外尊崇真武大帝，加封其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并调动二十余万军民大修真武大帝的道场武当山，特封武当山为

“大岳太和山”，居于五岳之首<sup>[27]</sup>。武当山得到明皇室和宗室的青睐，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道门名山。明朝皇帝和宗室多次在武当山举行斋醮仪式，本次在五龙宫发现的投龙水筒，即是在永乐皇帝敕命下举行的一次高规格金篆罗天大醮的见证。

主持本次斋醮仪式的法师张宇清，是道教正一派领袖龙虎山张天师一脉的首领。正一道以龙虎宗为主干，尊奉天师张道陵一脉为首领，在南方的符箓道派中有较大影响力。早在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元廷就授第三十三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兼领三山符箓”<sup>[28]</sup>。明初，龙虎山张天师一脉地位更高。张宇清的兄长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就颇得洪武和永乐两代皇帝的信任，早在明洪武十年（1377年）就开始执掌正一道教。他于永乐元年（1405年）陪祀明成祖祭天坛，后在永乐八年（1410年）寻访张三丰的过程中去世。同年张宇清前往北京，受到明成祖召见，并在其后许其嗣教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继承天师位“领三山符箓”，并多次在江西大上清宫、福建灵济宫等地多次举行斋醮祈福仪式<sup>[29]</sup>。张宇清作为正一嗣教天师，深受皇帝赏识，并有多次建醮经验，是这次国家祈福大典的最佳人选。

根据石筒刻文和文献记载可知，本次在武当山举行罗天大醮与投龙仪式具有多重目的。既是为了祭献明太祖朱元璋及马皇后的在天之灵，又想借此庆赞武当山宫观落成，感恩真武大帝庇佑，祈福国泰民安、普度天下苍生。这与以往发现的投龙仪式诰文中祈请目的相对明确单一不同，如唐玄宗铜筒诰文明确言投筒的目的是“愿蒙神仙长生之法”<sup>[30]</sup>，祈求长生不老；武则天金筒的诰文则是“投金筒一通祈三官九府除武墨罪名”<sup>[31]</sup>，力求上天原谅。而本次高规格、多目的祈告，充分证明了永乐皇帝对此次在武当山举行的斋醮祈福活动的重视。

综上所述，本次五龙宫所发现的投龙筒，记录了明永乐皇帝在武当山举办的一场规格极

高、筹备极盛的大型国家祭典活动。该活动通过道教斋醮仪式为家事和国事进行祈福，体现了当时武当山在明皇家的超高地位，以及永乐皇帝对真武大帝的尊崇之心。

## 六、结语

投龙仪式由祭告天地水三官发展演变而来，是在道教斋醮科仪结束后，将告神简文与祭祀礼器投放给神灵的关键环节，也是道教中最具特色的科仪之一。它萌发于东晋末年成为道教的祭祀仪式，凭借所承载的特殊宗教功能而在国家斋醮祭祀仪式中频繁出现，并于唐代正式成为国家祭礼，体现了道教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但投龙仪式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清人叶昌炽误以为“（投龙纪）隋以前未闻，唐乾封间《仰天洞王知慎投龙纪》为最古”<sup>[32]</sup>。直至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发表《投龙》（Le jet des Dragons）<sup>[33]</sup>一文，为现代研究投龙仪式的开山之作。近年来随着研究的重视，有关投龙筒的介绍和研究也日益深入，目前，武周武则天嵩山投龙筒<sup>[34]</sup>、唐玄宗南岳投龙铜筒<sup>[35]</sup>、敦煌文书中投龙仪式<sup>[36]</sup>、五代吴越国钱氏投龙筒<sup>[37]</sup>、五代南唐李昇投龙筒<sup>[38]</sup>、北宋真宗林屋洞投龙筒<sup>[39]</sup>等研究都已经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唐宋时期投龙筒的刻文内容及背景。由于早期投龙仪式和文字格式尚未完全统一，学界对其研究的方向和侧重点不同。

本次研究在刻文内容和背景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对元明时期已经成熟的投龙仪式进行全面研究，对该时期道教斋醮科仪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筒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以明代皇帝名义敕命道士、大臣开展的投龙礼器，虽然金龙、玉璧等礼器已遗失，但仍为包括五龙宫本体在内的武当山整体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为丰富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和科学支撑。

附记：拓片由武当博物馆舒成海完成。全文得到四川大学白彬教授的指导和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赵川的帮助，特此致谢！

- [1] 佚名.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天文书经[M]//道藏(第1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783.
- [2] 杜光庭. 太上黄篆斋仪[M]//道藏(第9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359.
- [3] 佚名. 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M]//道藏(第10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578.
- [4] 任自垣.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诰副墨(第2卷)[M]. 明弘治补刻本:15-16.
- [5] 同[4]:16-17.
- [6] 同[4]:17-19.
- [7] 李林甫. 唐六典·尚书礼部(第4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92:125.
- [8] 杜光庭. 金篆斋启坛仪[M]//道藏(第9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67.
- [9] 同[2]:361.
- [10] 同[2]:308.
- [11] 同[1].
- [12] 杜光庭. 天坛王屋山圣迹记[M]//道藏(第19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700.
- [13] 陈寿. 三国志·张鲁传(第8卷)[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260.
- [14] 吕鹏志. 唐前道教仪式史纲[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172.
- [15] 同[2]:366.
- [16] 张商英. 金篆斋投筒仪[M]//道藏(第9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131-134.
- [17] 林灵真.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坛信经例品(第2卷)[M]//道藏(第9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39-40.
- [18] 吕博. 本命与降诞:唐代道教“投龙筒”再读[J]. 世界宗教研究, 2019(2).
- [19]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元年一(第130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2389.
- [20]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一(第140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2427.
- [21] 同[2]:363-364.
- [22] 陆修静. 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M]//道藏(第9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840.
- [23] 丁安民. 武当山出土文物简介[J]. 江汉考古, 1988(4).
- [24] 同[2]:133.
- [25] 任自垣.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录金石(第12卷)[M]. 明弘治补刻本:15-16.
- [26] 同[4]:6-7.
- [27] 杨洪林. 明成祖与武当山真武大帝[J]. 武当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4).
- [28] 张国祥. 汉天师世家(第3卷)[M]//道藏(第9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831.
- [29] 佚名. 皇明恩命世录(第4卷)[M]//道藏(第34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793-797.
- [30] 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唐二十八(第56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386.
- [31] 垣垣. 道家金石略[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93.
- [32] 叶昌炽. 语石(第5卷)[M]. 清宣统元年刻本:37.
- [33] Edouard Chavannes. Le jet des Dragons[J]. Me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1919(vol. 3).
- [34] 董理. 关于武则天金筒的几个问题[J]. 华夏考古, 2001(2).
- [35] 同[17].
- [36] 周西波. 敦煌写卷P. 2354与唐代道教投龙活动[C]//敦煌学(第22辑). 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 1999:91-109.
- [37] 黄涌泉, 王士伦. 五代吴越文物——铁券与投龙筒[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12).
- [38] 杨小霞, 周晶纯. 南唐烈祖李昇投龙玉璧相关史实考据及铭文释读[J]. 中国道教, 2019(3).
- [39] 陈小三. 苏州林屋洞出土玉筒铭文初探[J]. 东南文化, 2010(4).

(责任编辑 胡秋儒)